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三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九七期 ——
（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5a）

【往事如烟】	飞蛾扑火——“海归”四十年，陈若曦忆文革	陈若曦
【亡灵祭坛】	疯狂的岁月，扭曲的人性——记“文革”中大舅的遭遇	乐 飞
【史海钩沉】	中国第一个敢揭露文革中吃人肉的勇士	毛毓圭
【难忘岁月】	新兴农场二厂惨剧	毛毓圭
【各抒己见】	文革：四十后的破晓	艾恺（Guy Alitto）
【前事不忘】	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如烟】

飞蛾扑火
——“海归”四十年，陈若曦忆文革

• 陈若曦 •

陈若曦，当代著名作家。一九六一年台大外文系毕业，留学美国，六六年文革高潮中回归祖国，七三年离开。现定居台湾。描写文革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归》及短篇小说《尹县长》，《任桂兰》，《晶晶的生日》，《耿尔在北京》等。

◇ “飞蛾扑火”

问：请问您一九六六年为什么决定进入中国？当时中国人卷入文革是身不由己，您可是“飞蛾扑火”啊。

答：不算“飞蛾扑火”啦。在台湾时就不满国民党腐败，觉得新中国光明有希望，到美国以后

又读了一些介绍中国的书，便决定争取回归。当时并不知道已经发生文革，还是在巴黎等签证时，看到《纽约时报》大标题，名作家老舍投湖自杀，才第一次听说文革。

我们几个留学生决心很大，把工作也辞了，住旅馆等签证，领馆最后不得不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上飞机时我说，要把小孩生在祖国大陆，睁开眼就能看见祖国的蓝天……

◇ 疯狂岁月

问：请您谈谈文革期间在中国的经历可以吗？

答：我和丈夫六六年夏天到达北京，正值文革高潮，在旅馆住了一年多，孩子都生下来了，才被分发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全中国兴起“造神运动”，我也收藏了52个毛像章，最大如小月饼大。南京热，工人常常不穿上衣，有人就把毛像章直接别在胸口肌肉上——你说政治和宗教是不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走火入魔！那时农民下地劳动，锄头上还挂个毛像。土地庙里也供毛；打电话不能先“喂”，得说“斗私批修”，对方回应“毛主席万岁”；写情书不能讲爱情什么的，要谈“增产报国”，结尾别忘记写上“致以革命的敬礼”……知识分子最惨是要接受再教育。军人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我们军代表竟然随口就指挥我们要把好好的运动场跑道挖掉改成菜地。农业大学的教授亲口驳斥我对58年大跃进“万斤亩”的怀疑，说应该相信人民的创造是无穷的……我一直在想，中国知识分子难道就没有一点清醒，怎么能给洗脑洗成这个样子？现在看台湾，够民主了，报纸什么都敢登，但也一样可以被洗脑……

◇ 任桂兰之死

我出来以后写过一篇小说《任桂兰》，完全是真名实姓，真人真事。（当时中共为了消灭影响，特别邀请梨华从美国回来，到南京水院实地调查……）任是学院党委书记，打游击出身，没受过多少教育。当时两派争权，把她关了一年，3、4个人24小时陪着，连上厕所也得跟，多累？时间一长便放松了。一天，她上厕所以后不见出来，看守人员撬门进去，发觉后窗大开，以为她逃走了，全学院，全市大搜三天，最后竟然还是在厕所窗下的粪池里找到她。小小一个粪池，深不及人体的三分之二，你说一个人要求死，欲望可以多么强烈，宁可臭死熏死……《尹县长》也是真的，原主人公姓雷。

问：你们自己在文革中也受过冲击吗？

答：我们家每人都有一段故事，这就是七三年我们为什么离开中国的原因。

◇ 都是煎蛋惹的祸

我先生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这成了他的“原罪”，要写自传向党“交心”。后来便被派到学校设在苏北的农场劳动改造。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盐碱地，条件很艰苦。

一天傍晚收工路上，饥肠碌碌的他望着火红的夕阳感叹：真象美国的煎蛋。同行一位青年教师随口接上说：我们这里叫荷包蛋，我一口吞一个。好啦，这下可闯大祸了，后面听见的党员马上报上去。第二天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无法从碌架床的上层爬下来，那青年教师睡的下铺已经被大字报糊满了，罪名是妄想“一口吞日”。我先生被牵连进去，三个月不能回家，天天写检查，要求从灵魂深处挖原因：为什么把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比作煎蛋，还是美帝国主义

的煎蛋？

我先生好几次跟我提到想自杀，他说有的人自杀后家人子女还被当“黑五类”受连累，如果他也要死，一定是“因公牺牲”，这样至少家人还有口粮，孩子也能上学……

先生的事没完，孩子又闯祸了。

◇ 第二个蛋

那年我儿子才三岁。

有一天，对门莉莉的妈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小陈小陈不好了，你的儿子喊反动口号啦。我一听头都炸了。原来是小孩从幼稚园放学回家，一路上学着用“打倒”连词，什么打倒爸爸，打倒妈妈，打倒老师……，我儿子自以为聪明，说出“打倒大坏蛋毛主席”。哎呀，我的痛苦不用说了，你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子家里出了两个蛋……

◇ 还有第三个蛋

我家是三代木匠，用大陆的话说就是劳动人民出身。我没想到自己也会出事。

七二年学校恢复招生，原来外文系的教员多半是圣约翰大学的旧人，学校认为不适合再上讲台，反而是我这从美国回来的，成了唯一可以教书的人。两个班之中，有一个是解放军班，吃住上课全在一栋楼内，属保密单位。领导说是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暗示我——学校是没有办法才用你，你自己要小心……

开始我很谨慎，渐渐学生喜欢我，我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心想多教些知识给学生。学期将结束时，有堂课讲到 NATIONAL DAY，我说：“国庆节，例如，10月10……”“日”字还未说出口，好几个红领章红帽徽眼睛象探照灯射向我，我连忙改口：“10月1日”。后面的课怎么讲完的都不知道了。回到家饭也吃不下，只觉得恐惧。差一点就完蛋了！

◇ “三种姿势”话文革

下决心离开中国，还是见到好朋友郭子嘉以后。

当初我们比郭先进入中国，郭希望我们探探路，如果不方便写信就寄照片出来，大家约定：照片中的人若是抬头挺胸，精神抖擞，就表示形势大好，可以放心来；低头搭脑，无精打采，则是形势不妙，应三思而行；整个人趴下，糟糕，别来了！

后来我们失去联系。

有一天在学校传达室值班的老师偶然发现一封准备打回头的挂号信，他是我们的朋友，于是便悄悄代我们取回来了。这正是郭的信，他们一家已到武汉。我喜出望外，请了假，背着孩子，用扁担挑了一挑到处搜罗来的食品，千里迢迢去汉口会朋友。见面以后，想不到才进来三个月的老朋友已经准备打道回府。他们说，学不致用，专业不对口，大学生只有小学生水平，别浪费时间，赶快走！郭太太对我说：共产主义这 SYSTEM 不 WORK。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不 WORK”！

我儿子听别人议论：“她从美国来，她的小孩不能加入红卫兵。”儿子双手叉腰质问我：“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为什么你偏要去美国留学？”

我先生每天晚上在枕边给我洗脑，他说，毛说过文革几年就要搞一次，我侥幸能逃过这次，下次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一九七三年，我给周恩来写信，要求离开。

◇ 关于周恩来这个“谜”

问：周恩来是二十世纪世界舞台上最亮眼的明星，同时也是一个最大的谜。您初入中国和后来离开中国都和周有关，请问您现在如何评价他？

答：当初我先生最迷毛，我最佩服周。周务实，做事。文革就听说他很会做“秀”，到北大看望红卫兵，就说，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来看大家。（不突出个人，）聪明，老二哲学。他到食堂和别人一样排队打饭，饭后自己洗碗……我不喜欢毛，所以信才写给周。

不错，我和你一样也觉得周是个“谜”，但这个谜会慢慢揭开的。旧金山大学教授X X X是海外第一个写周恩来传的人。书中揭露周特务出身，把叛投国民党的顾顺章一家灭门，连三个月大的婴儿也不放过……作者现在不让进大陆。

其实我认为周绝对有问题。想想，毛这么坏，这么远都可以看出来，这么近怎么就看不出呢？还维护他？这本身就是一条罪状。如果（周）早点来个暗杀毛，我还拥护他。

◇ 文革，中国倒退二十年

问：明年就是文革四十周年了，您特殊的经历使您能从远—近—远不同距离体验和观察它，请问您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您会后悔自己青年时代的抉择吗？

答：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只是当时回大陆的时机不对，那时就是不进大陆也会回台湾。

文化大革命，真不应该，使中国至少倒退了二十年！

（以上内容系根据芝加哥“文革学会”对陈若曦女士09/26/05及09/28/05在芝加哥的两次讲话录音综合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原载《文化与生活》2005年11月4日总第33期

~~~~~

【亡灵祭坛】

疯狂的岁月，扭曲的人性——记“文革”中大舅的遭遇

• 乐 飞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政治大劫难“文革”早已结束了，对现代的新新人类来说，它仿佛只是一个荒唐的岁月、远去的传说。就是对不少曾经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可能成了浅淡的记忆，沉淀在尘封的回忆里。可是，对那些家庭、亲属中有含冤受屈蒙难而

死的人说来，尽管时光悠悠，年载迢迢，那镂刻在他们心中的情感烙印，却依旧清晰如初，永不消失。就我而言，时至今日，对大舅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挨打以及他不屈抗争的情景，我仍然记忆犹新，鲜活似昨。

大舅打小聪明伶俐，持重老成，办事干净利索。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受老师的爱戴和同学的敬重。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穷，他无法继续读书，只好回家帮外公种田。1950年，工作队进驻农村土地改革，风华正茂的大舅积极热诚地参与这一运动，他的聪颖、机灵、天生的组织能力，很快引起了工作组领导的注意。土改结束后，在工作组领导的大力推荐下，大舅被调往乡里（即后来的人民公社）任文书一职。由于他工作出色，成绩凸显，被县领导看中，两年后上调县委组织部，不久晋升为组织部说话一锤定音的领导。当时，他是县委班子中提拔最快、年龄最轻的干部。正当他仕途坦荡、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从此大舅厄运缠身，噩梦萦绕，灾难连连。

一九六六年伊始，随着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揭开了“文革”十年动乱的序幕。在江西，“文革”的帷幕是围绕着支持还是打倒省委领导刘瑞生、林忠照而拉开的。当时，县、地区至省一级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支持刘、林，维护省委领导班子的，而各种红卫兵组织都是要打倒刘、林，彻底砸烂各级领导班子的。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以红卫兵及少数干部组成的打倒刘、林的造反派，和大多领导干部组成的支持刘、林的当权派。在这种氛围中，大舅理所当然的是站在拥护省委领导的当权派的一边，并被推举为县委支持刘、林派的头头。两派形成的初期，双方还只限于唇枪舌战、口诛笔伐，并无大打出手的武斗行为。可是，好景不长，这种表面平静的日子很短命。不久中央明确表态，坚决支持革命小将将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彻底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各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拥护他们的“保皇派”。一夕之间，大舅就成了全县最大的“保皇派”和反动的走资派。此时，那些得到上面鼓气撑腰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们个个趾高气扬，人人耀武扬威，气焰嚣张得不可一世。旋即，他们在全县展开了搜捕走资派和“保皇派”的疯狂行动。

就在红卫兵造反派大规模张罗搜捕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舅与他的两个“保皇派”同事偷偷地躲过红卫兵造反派的眼线绕道来到我们家，见到我母亲劈面就说：“外面风声很紧，听说明天红卫兵造反派就要全县大搜查，将走资派和保皇派的大小头目一网打尽，统统关押起来，进行批斗游街。因此，我们带了一些钱和粮票打算外逃，暂时躲到别省去，待形势好转些再回来。”听后，母亲有点紧张地劝阻道：“现在全国一片混乱，要是你们在外地被抓获，身边无一亲人，被他们整死了怎么办，那样的话，我们会担心死了。依我看，不如回农村老家暂避风头，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做打算。”在母亲的劝说下，大舅最终打消了外逃的念头，回老家躲了起来。

约莫过了半个月，红卫兵造反派不知从哪里得到信息，知道大舅藏在老家，于是，一大帮人坐着卡车到村庄上直呼要人。然而，村里的人都了解大舅的为人，知道他是个好人，拼命保护他，将红卫兵造反派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把他抓走。红卫兵造反派们恼羞成怒，但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空手而归。临走时，其中的一个头目威胁道：“下次来时，不交出人的话就用机关枪扫射你们这些刁蛮村民。”所幸的是，这种可能的流血事件并未发生，因为红卫兵造反派后来改变了策略，发现硬的不奏效便采用了软的办法：即威逼与大舅十分相好的、正在关押中的“保皇派”同事对他进行现身说法，骗他回去只是写写检查，承认错误，不会受批挨斗，更不会进行人身攻击。在这种诱骗下，大舅回到了单位。年老的外婆由于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决意跟儿子一起回到县组织部。她天真地认为有老母的在场，多少可以阻止红卫兵造反派对其儿子肆无忌惮地施暴。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只是她的善良愿望，在一些丧失良知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的眼中，她形同一只蝼蚁，她的在场与否，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大舅为所欲为的人身摧残。

大舅回到单位后，当日红卫兵造反派就批斗他。那天，夏日炎炎，熔石烁金。大舅两手被

反绑于身后（俗称坐“土飞机”），双腿跪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红卫兵造反派要他低头认罪，他的头颅却倔强不肯低下，这时立即招来一阵呵斥声，接着就是一阵雨点般的棒打。挨打后，大舅仍不肯将头垂下，这使得红卫兵造反派们气急败坏，只见两个红卫兵走上前一把揪住大舅的头发狠命地往下摁，大舅奋力反抗，眼神里燃烧着不屈的火焰。外婆看到在烈日下跪了几个小时且时不时受到棒喝的儿子，心如刀割，迈着颤巍巍的步子走到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们的面前，扑通一下向他们跪下，要求结束对大舅的批斗，或者至少把他转到室内。然而，他们对一个六十多岁的下跪的老母亲根本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直到最后大舅身体不堪折磨，中暑昏厥倒地，才结束了这场马拉松似的批斗。

这之后不久，县里的红卫兵造反派的头领们组织了一次万人批斗会。在这次批斗会上，县机关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和“保皇派”都被揪上台。一时间，只见台上挨斗的人黑压压跪成一片，个个坐着“土飞机”，人人头戴白纸糊成的有几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反动走资派或‘保皇派’X X X（名字）”，并打上红叉，颇像行将执行枪决的犯人。数小时的批斗大会后，接着是十几里路的游街。游街的方式别出心裁，造反派们责令几个重大的走资派和“保皇派”头头手握一面铜锣，要他们边走边敲，高喊“我是X X X，我是反动的走资派或‘保皇派’！我该死！”之类的口号。游街之后，县委所有的走资派、“保皇派”包括大舅被留下，要求他们跪在十字街头，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身心侮辱。长时间的挨斗游街，加上酷热饥乏，大舅再也无法正身跪着，而是有气无力地耷拉歪跪在地，这种跪姿立马招来一阵拳脚。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大舅刚挨过一阵拳脚后，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人，手持一把伞，走到大舅的跟前，用伞尖猛戳他的头，当大舅艰难缓慢地抬起头，那人又对着他的脸捅了一下，正中大舅的鼻子，只见鲜血涌出，血流如注。

那人为何对大舅如此心狠手辣毫无人性呢？事后在一次探视中，母亲从大舅的口中得知其中的根由。那人的老婆和大舅是同一村庄的人。她的男人好逸恶劳，嗜赌成性，把个原本不错的家赌得一无所有。老婆多次劝他改邪归正，他非但不听，还经常殴打她。一天，有人突然发现她溺死池塘。消息传到她娘家，娘家即召集了一些人包括我大舅赶到男方家讨说法。当发现死者身上伤痕累累时，不少人认为有可能是男人打死了他老婆而营造其自杀的假象。大舅对女方的死因也心存疑问，于是说：“尸首不要急于掩埋，迅速报告公安局进行验尸找出死亡原因。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谁料，大舅这一席公正客观之语竟被那人耿耿于怀，记恨在心，在大舅蒙难之时，他便乘人之危用伞尖狠命地刺大舅以泄私恨。

接二连三地批斗游街，没完没了的身心摧残，受尽凌辱的大舅终于不堪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他常常彻夜未眠，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诉愿，又像是在呻吟。有时他呆呆地坐在床上数小时一动不动；有时讷讷地望着窗外，眼光呆痴；有时傻傻地不停地拆床上的竹席。听说大舅的精神有点不正常，我母亲急切去探视他，费尽周折才得到红卫兵造反派的许可，来到了关押大舅的房间。此时的大舅和半年前未关押时判若两人，头发蓬乱，形体枯瘦，面黄憔悴，目光全无昔日的睿智敏锐，炯炯有神，而是呆滞忧郁，惊恐不安。母亲安慰了他一番，劝导他要坚强些，无论如何精神上不能垮，坚持下去，总有云开日出的一天。母亲临走时，大舅噙着泪对她说：“我一生勤勤恳恳，光明磊落，坦诚待人，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场运动中竟落得如此下场。如果我被他们整死，将来一定要为我鸣屈申冤。”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走出了那个阴暗潮湿的狭小“牢房”。

为了对在押人的集中管理，红卫兵造反派们把县一中改造成牢房，将县委及各机关的走资派和“保皇派”统统挪到那关押。在转移关押地的途中，一伙红卫兵造反派突然把大舅从队伍里单独拖出，带他来到北门山上（县枪毙犯人的地方），用枪顶着大舅的头对他说，你这个顽固不化、死不认罪的保皇派，今天老子要毙了你。说着，一声枪响，大舅倒在地上。半晌，大舅

回过神来，发现头仍然在脖子上。原来是那些人拿他穷开心，射出的子弹从他耳畔穿过，由此来傲唬他，指望大舅今后会老实点。一场恶作剧后，他们要大舅迅速赶上走出几里远的其他“犯人”。倍受折磨和惊吓的他，双腿疲软得根本走不动，两个红卫兵造反派就硬拽着他追赶前面的队伍。

转移到县一中关押的第三天，大舅和县委的走资派和“保皇派”们又经受了一场残酷的丧尽人性的批斗会。这次批斗会上，大舅除了受到惯常的拎头发、坐“土飞机”外，更有一位造反派看到大舅跪姿不正，就狠命地用脚踹大舅的胸部，导致两根肋骨骨折，大舅当场痛昏在地。让人难于相信的是，那位造反派看到大舅痛苦的表情，微弱的呻吟，非但没有一丝的内疚，竟从容不迫、毫无天良地说他装蒜。从这位打手的动作上，眼神里，你根本无法将他想象成是自己的同类。这次批斗后，大舅就一直卧病不起。

无休的凌辱，非人的生活，近一年半连续的身心摧残，大舅被折磨得患上了肝炎，却又无法得到治疗，生生地看着他病情一天天加重。即使他重病也未能使他幸免挨整，他不能走就拖他去会场，不能跪就“怜悯”地让他躺在椅子上受斗，有时实在不能到场，造反派们就组织人在他的病榻前批判他。

在一次连续高烧十几天后，大舅的下肢出现浮肿，肚子因水肿隆起，像怀有五、六个月的孕妇般。红卫兵造反派看到奄奄一息的大舅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批斗才通知他的亲属。外婆、舅妈和我母亲看到濒于死亡的大舅，一起跪下央求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们准许大舅保外就医，好说歹说总算获准。把他抬到县医院，医生诊断是肝昏迷，病情危急，建议到上海的医院碰碰运气。穷得叮当响的大舅家哪里有钱给他看病。没办法，我父亲只好求爹爹拜奶奶向单位借了一些钱，只身一人陪大舅到上海看病。一下火车，大舅的眼睛就失明了。等他们赶到上海中山医院急诊室，医生检查后便说，为什么这么晚才送来，病人已重度肝昏迷，无药可救。于是，大舅就搁在急诊室昏迷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五时，大舅忽然醒来，神志尚清，但不能说话了，用手比划着欲说什么，半晌父亲也未能领会他的意思。当晚七时，对死不肯低头的他还挣扎着试图坐起来，但极其虚弱、脚步已踏入另一世界的他此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随着他的一声模糊不清的拼命哼叫，大舅含冤逝去，终年35岁。身后留下的是，三个年幼的儿女，最大的7岁，小的仅3岁。

大舅在文革中所受的飞来灾愆随着生命的逝去虽已结束了，但他在九泉之下会瞑目吗？我想难，他的冤魂屈魄或许还在大声地控诉着那段动荡纷乱的岁月，我仿佛听到他的诉说：“虽然“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应该宽容以待。然而，我们可以宽容一切，但决不能宽容罪恶！不能让那些泯灭人性的悲剧总是重演！”

“文革”后，大舅的不白之冤得到彻底平反，黄泉下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可能会有若许的欣慰。

大舅舅，安息吧。

□ 2006年清明节写于澳洲

~~~~~

【史海钩沉】

中国第一个敢揭露文革中吃人肉的勇士

• 毛毓圭 •

右派平反朋友王祖鉴兄，是解放前北京中国大学地下党员，解放后，参加南下工作团。49年底到广西，五十年代初到来宾县当了县委副书记。反右派他首当其冲，不当也得当。改造几年，63年摘帽，放到武宣县文化馆打杂，还不能当干部。其实，右派摘了帽，成为摘帽右派，实际无期徒刑。原来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五年可改变成分，富农三年，实际没见改过，就算个别地方地主、富农依手续改变身份，但仍属五类分子。地主、富农主要还是就地管制劳动。可是右派半数以上离乡背井去劳改场所接受劳动教养，是不宣布无期徒刑的无期徒刑。王到了文化馆，因是五类分子，会议不通知他参加，文件也不得看，报告更不给听，倒也没有什么；眼不见耳不听，总可以与世无争了吧！但是，除了《毛选》，他也不能看其他书。苦恼自不待说，但他是个有脑筋，肯动脑子的人。“文革”在武宣县掀开后，他十分惊讶。这不是摧毁文化，不要知识吗？学生批斗老师，他已无法容忍；看到打死老师，更忍不住了；后来发展到吃老师的肉、肝。他的脑袋炸了，思想沸腾了，这是人的世界吗？他这时还没有对党中央丧失信心，于是一连几天，偷偷写报告，将武宣县杀人吃人肉的情况写了上去。怎么送出去？邮局是不行的，什么都要检查，尤其是给中央写，根本不能放行，弄不好，退到所在单位，肯定挨批被斗。自己又无自由，又无钱，去不了北京（那时，任何人外出本大队本公社，特别出县，必须大队、公社甚至县的证明，无证就寸步难走）。后来他终于想到广州还有朋友，由广州朋友设法将材料带到北京，交到中央信访办。二个月后，中央才来电制止。区党委责成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少将）率一连步兵，直趋武宣县干预制止，并通知全区各地县一律执行，不得再吃人肉。但事隔几个月，被杀吃的人数并无统计上来。15年后的83年处遗时，方再查此事。各县曾查了一下，但实在太残忍、太惨、太丢丑，就不再搞下去了，因此材料非常不够，情况也非常不全面。据我听说，当时报上来时，已超过百人，后来中止调查和上报，这个数字就突然中止。据王祖鉴说，武宣一个县，他个人即可列出100以上名单。后我听平雷（曾在85—90年任钦州专员，是我清华校友，58年毕业于水利系，为区人大常委财委主任）说，合浦县吃人肉很可能超过武宣的人数。

我曾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听说有人拼死吃河豚，因河豚有毒，弄不好，吃后中毒而死；可是河豚肉实在太鲜美了，这么好吃，死也值得。我亲眼目睹吃癞蛤蟆致命的。61年在南宁西郊石埠农场上灵分场，那是南宁地区公安处的收容队，那时饿死人很多。有一天，一个年约50岁的本省人，出工时因肚饿，不肯走，带班监管干部再三催还不肯走，拿棍打他，他干脆坐在地上，不动了。突然，地铺下跳出来一只癞蛤蟆，慢慢地跳到这个人身边。他用手抓住就向嘴里送，牙齿咬得骨头咯咯响，满嘴唇是鲜红的血。干部见了，立刻叫他别吃，快吐出来，还用鞭子撬他嘴巴。那人硬不肯，继续不停地吃，不到三分钟吃完了，还用舌头舔干净血迹，生恐浪费掉。无可奈何，干部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这个人叫喊起来：“肚子难过，又痛又揪心。”大喊大叫，这个人好好的，太饥饿，饥不择食，中毒而死。这种死，一定是难受而痛苦极了。不过从旁观者看来，也许比饥饿致死、被活活打死、被人吃了更好些；比还活着开膛掏去肝肾、眼睛那痛苦来，更不知要好多少倍。吃人肉最残忍。叫我吃，就是宁可死也不会去吃的；但是我问过几个人，（并非都是广西人）有的说还是会去吃的。因为你看那一溜儿跪在地上的“五类分子”、“牛鬼蛇神”，都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是劳动人民的死敌，你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反过来杀我们，还要寝皮吃肉，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只有打倒他们，干掉他们，吃掉他们，才是最革命的一员。

吃人肉，把文明人类的天性，把不食同类的动物性，统统抛弃了！希望能有人在今后到各县去搜集吃人肉情况细节，反映出来，以为后来者诫。

王祖鉴同志在来宾任县委副书记时，来宾县饿死人，频频告急，县委县府尽可能地去组织抢救，开仓放粮。但是这样的好干部，却在57年被打成了右派，驱至农场劳动教养。他爱人叫张慰人，也是“硬骨头”，不承认丈夫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不肯划什么界线，结

果打成更坏的“右派”。很久以后，王才知道妻子也在同一个农场劳教，但彼此不允许见面，这对夫妻从此同在武宣县境内改造。老王先是烧砖瓦。不少同犯被饥饿和超强劳动夺走了生命。好在这个场的领导，其中一个王的旧部，大饥饿来临，死人日多时，立刻给王改了工种，去放牛。他每天到野外，常设法捕蛇鼠等野味填肚。有时遇上一个大鼠洞，就可以吃几天；尤其是那一窝窝尚未睁开双眼的小婴鼠，用酒泡了，连酒带鼠（几已溶了）吃下去，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他捡回了一条命。极残酷的劳改生活，极不人道的处境，王祖鉴并未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虽党藉开除，他仍每月留下党费，并不断地存入银行。人们见他这种小额存款后，一眼即望穿其“险恶用心”在准备翻案，警告、威胁、斥责、批判他，但是他一如以往，无所畏惧，不知悔悟，照存不误。

“文革”中，武宣那么多吃“人肉”的事实，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听到吃人肉的情况时，已经吃开场面很多天，这时他妻子怀孕了，他们决心去打胎。他和妻子去医院的途中，恰好碰上杀人开膛、割肉的场面，交通为之堵塞。他们只好原路返回（手术不成，终于后来生下个姑娘）。于是他，坐下来上书。这才有后来上级派欧致富带兵来武宣制止的措施。王上书的功劳，救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也制止住多少人的兽行。王虽然功劳很大，但他却激怒了当局，尤其是武宣县委革委。查到他王祖鉴告“黑”状后，找出了他别的“罪状”，一次次拖到全县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去狠斗，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他在那几年被那些杀人吃人的恶魔折腾得死去活来，直到八十年代胡耀邦上台，政策已改，他才被调到南宁师范学院（今改名广西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总支书记。三年后，以健康原因，提前离职休养。但十几二十年来，他从未中断对各种贪污腐败的斗争。各地同志，特别是柳州地区各县（来宾、象州、武宣）及柳州地区党政各单位同志经由他上交给中央各部门的揭发检举材料，估计有几百公斤重。

王祖鉴同志确是一位难得的斗士。

附：王祖鉴，广东省人，1925年生，幼年起即在北京生活、学习，在大学念书时，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北京解放之初，他奉北京市委之命，加入了四野南下工作团，到了广西，工作积极出色。任来宾县委副书记时为民请命，被冤划为右派。夫人张慰人因不肯与右派丈夫离异，也成了右派。79年改正后，先后任广西师院中文系及地理系党总支书记。2002年逝世。

□ 原载《民主论坛》

~~~~~

## 【难忘岁月】

### 新兴农场二厂惨剧

• 毛毓圭 •

“文革”浩劫，当然是最高领导者应负首责；新兴农场二加工厂的惨剧，则经理高振卿难辞其咎：田映、王成活活被毒打致死，迄今不悉尸骨何处；阎振伦、吕甫周、霍实、庞昆明、顾家良、伍廷枢、喻良璋以及阳有富等十多人，莫不惨遭酷打，不是血肉模糊，也是皮开肉绽。顾、庞甚至被捆绑、强押至新兴农场禁闭室关押几月至几年。其他人或戴上镣铐，关入本厂临时自设的牢房；或强交群众积极分子严管不贷。这是1968年间二加工厂发生的惨剧。若非1969年军队进厂驻扎，全体干部及其家属，全体就业人员（均已摘帽的右派和少数无帽就业人员）一律被调去一加工厂，那么，这一人间惨剧，更不知将伊于胡底。事隔30余年后，一位当时斗打他人近乎疯狂的“积极”分子亲口对我说，连他这样的人竟然还余悸后怕，生怕自己最后也逃不脱虎口。而像我本人，迄今还记住二厂高振卿经理成天撕心裂肺怒吼狂叫什么

“田是一块一块耕，饭是一口一口吃，你们是一个一个斗，谁也别想逃掉”、“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面”、“现在是先斗小的”。有好几次，他露骨地点名地公开直指我说：“过去你跟老反革命（指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反革命，现在又跟新反革命进行反革命。群众专政放不过你，我们也饶不了你。”

在二厂，谁都知道，7名干部在文革中分成大小两派（即联指派为大派，四二二派为小派）。韦诗江指导员、高振卿经理、韦德隆、郎艳琼干事夫妇是联指派；黄宏森队长和刘克仁管教员是四二二派；司务长则哪一派也不入。应该说1968年以前，主要是他们两派之间在格斗，与我们没什么干系。我们近百名无帽就业人员，是全场25个中队里，唯一全是无帽的公民队，有选民权利，且发有选民证，还参加过选马场长为人民代表的普选活动。这个时期却降为和其他队一样，接受“军管”，还居然说享有“不受冲击”的待遇。但是，1968年大灾大难突然从天而降。

庞昆明被第一个揪出来示众。那是个星期天，打扫清洁卫生；庞因去修月刮（农具）而未在小组内劳动。管教员刘克仁便动手将庞推推搡搡，命令他去中队部交给韦诗江指导员处理。庞作了些辩解，韦即拔出手枪，开枪击中庞的腰部，鲜血直流，幸未中要害，不然打死也白死。这还了得！于是全队人员被集中举行批斗大会，上级大队部教导员和其他干部以及军管代表，都全体驾临，荷枪实弹，剑拔弩张，密封四周，环包八方。批斗尚未正式开始，高振卿一声不吭，手举棍棒，气势汹汹直朝庞昆明的光身、背、腿、臀部猛劲一棍棍啪啪击打，来来去去，无稍停歇，足足打了46下。木棍被打断两根，又就地拔起围护花木的木棒，继续用劲击打。庞昆明伤口的血仍在流着，却硬是不吭一声。在旁边的教导员覃韩这时不得不上前隔开，没有让高再打下去。这时高因用力过度，只好靠边，用打人的木棍支住身子站着。军管代表走到会场中央，狂吼什么“你们想要什么自由嘛！一点都不给，半点也不给。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就把庞昆明拉到中队部，再五花大绑押到场部关押了几年。

事有碰巧，养猪的脱帽右派伍廷枢，根本不了解外边发生了庞昆明事件，在他去中队部领饲料粮的途中，惊见庞昆明血流倒地，迅即叫龙咏孙医生速去急救。不料，被黄侃杰看了个正着，立告高经理。于是，在送走庞昆明去场部关押的当晚，二厂就立即召开批斗伍廷枢的毒打大会。伍并无其他言行，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良心，因此，他无惧无畏，昂首挺胸，浩然屹立。高振卿煽动说：“伍廷枢不睬不理，不检讨不批判，大家说该怎么办？”于是，便有几个人立即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小个子的伍廷枢，迅速被压倒地上遭受一阵踢打，弄得全身都是泥沙土粉，可是在这场几个小时的毒打中，伍始终一声不吭，一言不发，硬是顶到底。提起黄侃杰，早在此前个把星期，在斗喻良璋（原四组组长，黄是他的组员）时，已崭露头角。这次检举伍廷枢，是为其成为积极分子铺路。过了两个月，果然，黄不仅成了积极分子，而且当上记分员，还担任什么大会总纪录。

不久，又发生了顾家良事件。为了打茅草夹，中队下达割茅草任务，定额100斤（因草源有限，实难完成），各小组早早地就出工了。顾（组长）这组16个人，因草源好，中午就完成任务，经过秤，质佳，量也超，上报了队部。下午，黄队长来大宿舍，见顾全组人都静躺在床上，就问组长顾，为什么不出工，顾讲完成任务了。黄强词夺理讲：“你们只完成了定额，但八小时的任务，还有一半哩！出工，出工！”全组无一个动弹，黄只得无奈离去。

晚上，队部召集全组人员，去队部门前开会，我也到了会。高经理，还有一个管畜牧菜园饲料组工作的韦德隆主持开会。16个人团团围坐着，谁也没开腔。高经理一个人，绕着大家围坐成的外圈，边绕边骂，走到顾家良组长身后，似是冲着这个为首的组长说：“你说说，你改造好了没有？”顾立刻掉头对高经理说：“那你改造好了没有？！”高听后，怒火猛燃，厉声怒吼：“你这是什么态度？！是反改造！”接着就问大家：“你们都听见了吧！”大家没有出声。一

——我们当然都听见的，十分清楚嘛！但是你高某难道还不明白完成定额是表现好，正反映了改造好嘛。而你们这类干部却颠倒是非，横行霸道，还要批斗完成任务的好人，理应好好改造——高更气急败坏，就指着16个人，挨个问：“你听到了没有？”回答居然是：“没听见”、“听不清楚”、“没注意留神”……高只气得大声直叫：“散会！”把顾家良一个人捆绑起来送去场部关押了40天。

斗田映，有高经理大棍的示范，结果田映被踢得倒地打滚，刚能起来，又是一轮毒打。他干脆就自己用头冲墙，以求解脱。果然，次日高经理悻悻然宣布田映“不吃白米饭”了（把整人致死说成不吃白米饭）。

王成心中十分明白：既挨点名，必被毒打惨死无疑，于是便出走逃难，岂料外边也是兵荒马乱，王在踽踽徘徊中，被收容进了收容所，押返新兴农场。高经理高兴极了，立刻把王领回二厂，当晚即开斗争会，在会上大叫：“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布下天罗地网抓你回来。”王成挺胸昂首，镣铐叮当进入斗场，什么也没有交代（其实也无可交代）。他平时与任何人都平和相处，无任何个人恩怨，也与二厂领导无争，成天除了写黑板报公布各生产组数字或者抄发报纸外，跟其他人并无多少来往，不过大家都很尊重他。在国庆节前几天，他被狠狠地打了几晚。节日休斗了二天。重开斗打时，王成已站不稳，倒在地上。几个积极分子打手，一涌而上提手、提脚凌空抬起王成，又重重摔下，他只哼了一声。王成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告别了人间，一张席子卷走了事。

斗霍实，是讲他和月亮塘赵延年组织了反革命集团，也斗得死去活来。我本人托黄松蕃新购的一套纯毛棉衣裤失窃，也不敢报失。事后一年，许多知道这件事的人，祝贺我是老天爷照顾我，逃过了这一大灾难。

斗吕辅周时，天已入冬寒冷，他早已穿好棉衣、棉裤等待。高经理也早已看在眼里。斗争尚未开始，高就对大家说：“这是个早有准备的，大家必须更狠地斗。我们特地打了一付30多斤的脚镣给他戴！”一米八高大个头的吕辅周，银铛进入会场，当然交代不出什么反动言行。金子瑾是柳州市已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有一、二次从柳州去穿山路过二厂时，在马路和吕邂逅偶遇，寒暄几句就走了。可是高经理就煽动一些人起来斗打吕，什么“订攻守同盟”啦，“里应外合”啦。吕这个小组在马路边拾到红卫兵、民兵丢失的一颗手榴弹，吕作为小组长，主动亲自上交中队部。但是，高经理竟借此煽动说吕拟炸掉中队部是反革命现行活动。于是，竹鞭、木条齐发，拳三脚五交加，斗打进行了六、七天，因为解放军要来驻扎，我们二厂全体一律并入一厂（相距十二、三公里），吕才免于一死。但是他胳膊和腿脚上的镣铐烙印，却伴随他整个余生（吕2002年病逝于龙州）。

被斗、打得最惨的数阎振伦。他一被投入斗争，就是一顿暴风雨般拳打脚踢，上下左右鞭抽帚揍，本来光秃的头，就鲜血四迸，淌流全身，整个成了血人，只见眼白还有点白色。不论他交代坦白什么，都不算数，因此挨斗了一、二十个晚上，身上血迹也不让擦，鲜红的血，干了成黑色，他就成了黑人。斗完了就脚镣手铐，叮叮当当押至队部关押（原为干部洗澡房）。白天由专人看守押往工地劳动（镣铐在身）。

最后，我想再讲一点阎振伦。他的胞兄阎振兴，是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早年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当过清华、河南大学教授。1946年赴台湾，历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长、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委等要职。振伦右派改正并恢复工作时，自治区特地调他担任广西区政协委员。1983年，他应当时邕宁县委书记之请，合作创办邕江大学，是广西第一所民办大学（全国是第二所）。这是他的功劳。他和我（有几次，戴弋也在场）有过多次商谈，并由我介绍去教育部直接请示部长

何东昌、滕藤等，获得批准备案。可惜，为时不久，他患癌症去世，终年58岁，未能目睹今日邕大的新发展。振兴先生也于今年病故，享年95岁。1949年振伦以为：解放了，可以为人民服务，自由驰骋，不肯随胞兄去台湾。岂料，他当年正在学习的华北文法学院被勒令取消，师生员工进入“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南工团”；个别少数人则被军管会强行吸入“集训班”等进行关押、集训。当然，临解放前，也有的师生自行离校南下，有的去了台湾，可是，振伦主动留下，等候解放，再学习，以便毕业后为人民服务。他欢欣鼓舞地参加南下。广西解放了，他在隆安教育局工作，1958年竟被打成右派，被送劳动教养。6年后解除劳教，回不了家，就带妻女来新兴农场，准备一辈子就业，过“三种人”生活。文革开始，他是被惨斗得最绝的，被摘帽的右派积极分子奚士衡等猛押狠打。摘帽的社会劳教司徒权，更是一边不绝口地骂“咸家铲”，一边朝那一直流血的创口猛力抽打他简直成了个血人。由于田映、王成的惨死，高经理不得不交代打手们不要向致命处进击，所以被斗得流血而不丧命，创深而不致死，痛苦而不气绝。折磨、摧残至于极点，非拙笔所能形容。

这个振伦，后来被广西区政府副主席、区党委组织部长张声震特地调离隆安（阎是县教育局副局长），邀住入国旅，当然是统战对象。因为他胞兄振兴是大科学家，还是台湾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也与胞兄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堂兄妹还在香港见过面。振伦不计前嫌，不记22年巨深的创痛，投入到广西第一所民办大学创建工作，这比那些高官厚禄、无所作为的人，特别是那些残害无辜的人，无论在人格上，业绩上，是何等天大差别啊！！

□ 原载《民主论坛》

~~~~~

【各抒己见】

文革：四十后的破晓

• 艾恺 (Guy Alitto) •

尤其因为你也是一个被放逐之人，
所以我们破例来和你商量。
你愿意不愿意做我们的首领？
穷途落难，未始不可借此栖身，
你就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旷野里吧！（1）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

第四幕第一场，朱生豪译

一、引子

再过一百年，历史学家将如何铭记和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我的论点是，毛泽东理想的本质是反现代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反现代化）。文革将首先作为二十世纪最突出的“反现代化”现象之一而被人们所铭记。

我对文革的分析可以归纳为这样一点：毛将整个国家“延安化”了。延安模式本身是由某些万不得已的具体时空条件产生出来的，但是，毛却将这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变成了一笔财富，他在1949年掌权后继续推行延安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将它们变成了最可宝贵的东西。毛担心中国社会出现复辟，重新走上“封、资”道路，于是，他就圣旨裁示，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国是必要的。毛的延安理想的本质是反现代化（2）。

二、权力斗争还是理想的冲突？

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文革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毛牺牲了现代经济的发展，以求实现他那独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但这一追求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一解释强调毛的最终动机是在中国实现他那“美好社会”的蓝图。另外一种相反的解释是“权力斗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经常是一些政治学家——强调运动的那些纯粹政治的层面，认为运动的起因是毛与政治领导层之间单纯的权力斗争。由于大跃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毛的实权被中共领导层削弱了，于是，毛就力图重掌实权，贯彻自己的政策，控制党和国家。

有时候，人们将两种解释结合起来：这里面既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又有理想的因素。毛感到他为中国未来设计的理想蓝图面临着危险，尤其担心某些阶层——特别是城市精英阶层——会“卷土重来”。他认为苏联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因而担心中国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他还怀疑中共领导层的革命信念（正是中共领导层使他失去了掌控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的权力）。最后，毛也担心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谈到过自己的死，说是“去见马克思”。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他是马克思的嫡系，这个角色扮演得好不好，事业的成败如何，他得向马克思有个交代。于是，为了重掌权力（也为了重新发动革命，实现自己的理想蓝图），毛找到了一批支持者——主要是他的妻子江青和一帮把持了文化教育部门的野心勃勃的“激进”知识份子、掌握军队的林彪，以及几个负责安全部门的官员如汪东兴和康生。周恩来也是毛的支持者，但他所起的作用不大一样。无疑，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参与，政府就会陷入瘫痪。我想，再过一百年，人们在研究文革时也许不会那么看重权力斗争的一面，而会把文革中体现出来的毛主义的理想蓝图看成是最主要的。

三、红卫兵和毛泽东的精神理想

在政治以及其他方面，毛的所有支持者显然都在图谋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支持者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一帮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最富有理想精神，正处于青春期骚动，因而就成为最具叛逆性格的一群。文革中最触目、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批年轻小将的造反行动。与毛的其他支持者不同，至少在运动初期，他们是完全不带个人目的的。

自从60年代初期以来，毛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了，不过，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从未受到过挑战。无论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中，还是在马列主义传统中，最高政治权威都同时是最高理论权威和精神权威。中国的皇帝不只是行政首脑，在某种意义上也十分类似于凯撒/教皇。同样，在马列主义传统中，最高政治权威必须同时是最高理论权威，例如列宁就是这样（因此，尽管斯大林对抽象思想并无真正的兴趣，其抽象思维能力也很贫弱，但他还是找人捉刀，以他的名义写了几本高度理论性的著作）。从毛的地位来看，他简直就是中国的最高精神权威。因此，红卫兵觉得自己在完成一项精神使命（他们正处在十几岁的青春期，有一种推翻父辈权威的冲动，这一精神使命自然就与这种逆反心理正好合拍）。考虑到这一点，红卫兵为何对毛及其理想如痴如狂，万分忠诚，就不难理解了。

在我看来，红卫兵是一帮经最高精神权威“认可”发泄其“本能的”叛逆冲动的青少年（我相信，这也是文革能够吸引当时西方的青少年及年轻的成年知识份子的原因）。按其本性来看，这些充满理想主义和反叛精神的青少年的行动必然是否定性的和毁灭性的，与发生在一切地方的青少年反叛一样，最终不会带来任何创造性的有益成果。

四、毛主义的本质

毛的理想是甚么？为甚么这种理想的核心是反现代化？确实，毛从来没有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他在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期间（从40年代到1976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划中推导出他的理想。1949年后最具有“毛主义”特色的时期和规划就是大跃进和文革，两者在某些基本方面都让人想起延安时期。对毛来说，延安时期是“黄金岁月”，终其一生，他一直都把这个时期当作各种价值的试金石。

我们应当记住共产党和毛泽东在1937年的处境。当时，他们被迫撤退到一个赤贫的地区，陷入日本人的围困中。根据地的通讯和交通条件十分糟糕，那没有现代化武器，可以说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东西。他们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因而其所采取的政策和组织形式与马列主义几乎没有甚么关系。他们士气高涨，激情洋溢，尤其与中国那些非共产党的政治群体相比，更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不仅熬过了这个困难时期，而且还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和毛泽东马上就面临又一个劲敌，这就是国民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在武器和兵力上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共产党再度奇迹般地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在毛泽东眼里，这些价值不仅本身就是好的，而且还在明显不利的情况下为共产党赢得了胜利。于是，毛就认为，这些价值不仅对建立一个“美好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富强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这些价值同时具有实践和规范两方面的意义。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各种方法、态度、策略依照这一系列价值形成了一个融贯的整体，并获得了成功。也就是说，在中共熬过了日本人侵略的那个困难时期并取得了内战胜利后，毛泽东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的那套办法当成了治国方略。对他来说，这一经验似乎具有了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因此，一旦大权在握，他就让整个民族接受了这一笔宝贵财富。下面列举的一系列特征都形成于延安时期，当时共产党在与日本人打仗，形势异常严峻。我们将看到，这些特征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为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的网络。每个特征都与其他特征有联系，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关于美好社会的全盘理想。由于毛在用文字表述这些价值时采用了马列主义的语汇，因此，国外学者经常将整个方案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自力更生

毛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自力更生。这原本是毛在延安时期迫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但却成为大跃进和文革的显著特征。在这整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强调“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强调土技术。当然，毛和中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自力更生，因为遥远的空间距离使他们无法接触到现代技术——无论是经济技术还是军事技术。自力更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现在却变成了一笔宝贵财富。很显然，由于在战争期间完全接触不到现代技术，就有必要采取一些土办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最实际的策略。

在50年代后期，这些用语，连同“两条腿走路”之类的说法，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到了文革时期，更成了家常便饭。

（二）民粹主义

第二个特征显然与第一个特征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毛的民粹主义（3）。如同毛的一般世界观中的许多东西一样，这种民粹主义也带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印记。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被唤起的民众是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甚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天命在现实世界中要靠人民大众的实际体现。群众被调动起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谁拥有天命。自从延安时期以来，毛用来对抗敌人优越的非人力资源的唯一凭藉就是人力资源。

（三）唯意志论

毛的民粹主义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哲学上的唯意志论，另一个是所谓的农村主义。按照唯意志论，人的意志先于或高于人的理智或理性。毛的唯意志论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它表现为这样一种信念：不管存在着甚么样的客观障碍，单靠意志和决心就能够做成一切事情。靠着这个信念，再加上群众万能的信念，热情、坚定、被唤起的群众便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毛在延安时期撰写的许多著作都表现出这一特征，尤以〈愚公移山〉（文革时期的“老三篇”之一）最为明显。移山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愚公却要依靠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做成这件事情。在这个传统寓言中，这种态度最终感动了天神，他们就帮愚公把两座大山背走了。毛把天神的神性的万能与同样“具有神性”、同样万能的四万万中国民众进行了直接类比。于是，在毛的世界观中，士气高涨、道德高尚、决心坚定的民众就成为无所不能的终极力量。

由于这种唯意志论的态度，也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毛不断地强调教育、道德劝化、思想影响、意识形态灌输和文化，认为这些东西是最最重要的。毫无疑问，中共之所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它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这支军队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思想改造而被政治化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不断的道德熏陶的结果。延安经验证明，对军事胜利而言，这一点比武器、军事技术、装备等等更加重要。要取得胜利，内在的道德素质（精神、热情、意志）比任何其他条件都更加重要。

（四）农村主义

毛的农村主义是其民粹主义的自然结果。当然，在陕北，毛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强调农村社会及其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在整个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因此，任何民粹主义思想自然都会重视农村。1949年以前，中共和毛仅仅与农村社会打交道，后来，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农村社会及其道德优势又再度受到重视。城市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五七干校大多设在农村地区。对毛来说，农村社会是真正的知识和道德的终极所在，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城市社会才是知识和道德的终极所在。

（五）平等主义

大多数人都将一个特征与文革等同起来，这就是极端的平等主义，一种绝对的经济平等（而非社会或政治平等）理想。这也是文革对西方左派青年产生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陕北地处穷乡僻壤，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能提供多少剩余物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不可能出现大的差异。这个地区没有必要的经济资源来支撑经济不平等。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于是，这种均一性也成为毛所设想的美好社会的一个特征，后来更成为文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其目标是要彻底铲除生活方式的一切差异——从衣着到娱乐，再到语言，都要做到整齐划一。每个人都看同样几出样板戏，每个人都读同样几本书，每个人在衣着和用语上都效法“群众”。毛的理想是让全中国的老百姓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上达到绝对的平等（当然始终要把他自己排除在外）。我的许多中国朋友（尤其是当过知青的朋友）告诉我，在文革期间，每个人都要效法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大老粗。

（六）红专对立

提到文革期间强制推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均质化，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文革的另一个人所共知的特征，就是对知识份子和专家的敌视。红与专的两分法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自然，

当时的理想是又红又专，但实际上，红要比专更为重要。这个两分法涉及到许多因素，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前面列举的一系列特征一样）。红专问题首次出现在延安时期，当时的表述方式是德与才。这个问题（至少按照我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反映出儒家的传统信条：才过于德为小人。后来，德与才改为红与专，但其内涵并没有变化，就是说，政治觉悟（德）比专业才能（才）更为重要。这意味着，一旦具备了正确的思想觉悟，就能够在“外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早在文革前的社教运动中，中国的媒体就有连篇累牍的宣传报导，证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效用，一旦在各种实际活动中（例如外科手术和制造业）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够取得很大的成效。

（七）作为灵魂状态的阶级

思想觉悟的首要性引出了下一个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根本的（尽管不是最显著的）特征，大体上看，正是这个特征最鲜明地将毛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我们可以将这个特征称为“阶级的主观化”，或者换一种说法，阶级变成了一个道德范畴，而非社会范畴。这一点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直接相悖，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毛实际上把这个原理颠倒过来，让意识来决定社会存在。于是，“阶级”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实际社会状态，而变成了一个人的心灵状态。如果一个人有了正确的内心道德状态，具备了正确的思想意识，那么，即使他并非在无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即使他并非城市产业工人，他也具有“无产阶级觉悟”。诚然，毛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从他的种种政策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论者经常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尤其在延安时期——十分强调正确思想的教育和灌输。阶级斗争成为一出永不停息的道德戏剧，这是灵魂内部的善恶斗争，类似于摩尼教的那种斗争。这就是为甚么一些研究文革的学者采用了“德治”（virtuocracy）的概念〔4〕。毛主义的这种倾向怎么是“不得已而甘愿为之”的表现呢？延安有一些甚么样的客观条件呢？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社会的实际社会存在又如何呢？就毛泽东领导的政党而言，其领导层几乎完全是由境遇较好的社会阶层组成的，毛本人也不例外。这个政党的正当性和历史作用要归因于其无产阶级性质，然而，在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层中间，没有一个人算得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城市产业工业家庭中长大，并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做苦工。不仅如此，党的活动中心是在最土气的农村地区，方圆几百英里看不到一家现代化工厂，被组织起来的是彻头彻尾的农村人口。考虑到这些客观情况，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很难称得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强调主观方面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毛所处的环境中，日本人在客观的军事技术实力和组织方面占尽优势。因此，毛就强调他所能控制的那些因素的首要性，这就是士气和道德，也就是战争中的主观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毛为甚么强调灌输和教育的重要性，并赋予意识和主观状态以首要性，使之凌驾于客观因素之上。

毛的思想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倾向，或许是由于他有一种“不得已而甘愿为之”的倾向。不过，毫无疑问，他也从中国的（或儒家的）世界观中继承了某种东西。有几位学者已经指出，中国传统思想将思想觉悟放在首位〔5〕。一些论者认为，按照新儒家思想，只要有正确的思想觉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6〕。在中国传统中，学习不只是一种智性行为。通过学习，一个人不仅要提高知识水平，而且还要提高道德水平。毕竟，传统科举考试的目的就是要遴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在中国传统中，经常是以小组形式展开学习的，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在知识和道德两方面都得到了完善。孔孟与其弟子的学习小组是这样，晚清康有为或其他改良派人士的学习小组，以及普通中学生的学习小组都是这样。1949年以后的学习小组制度也是仿照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只不过用“政治”代替了道德。

（八）反智主义

中国的不同传统对毛和文革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如何解释文革期间对知识份子的攻击呢？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攻击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矛盾。这牵涉到许多因素，在此，我只想讨论一下反现代化这个因素，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过去几个世纪，出现了愈来愈强大的专业化倾向，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正如各类官僚机构的建立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样（如前所述，官僚化本身就是一种针对行政职能而建立的专业化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机构的各部门日益提升了其职能的专业化水平）（7）。正规的专上教育就是形成和强化这种专业化职能分工的手段。就其本质来看，现代“知识份子”都是专家。如同工厂的造活动一样，知识份子的日益专业化在各个技术领域——医学、信息管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等等——创造了更大的效率。在延安时期，这种现代类型的知识份子是比较少的，而现代类型的技术人员就更少了。在党内或根据地，知识份子大多是中学毕业生。这样一来，人们就不甚重视知识份子的那些与实际经济生产相脱节的理论知识，而更加重视来自直接经验的知识。

毛主义的一系列特征的对立面是甚么？当然就是城市，因为城市是专家、技术人员和官僚的大本营。这些人的错误就在于脱离群众，由此就必然形成了极端的的不平等。城市不是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的用武之地，而是形成一种等级结构，拥有特权，一切都按部就班。城市是现代化的中心。毫无疑问，毛并不反对工业化，但他却总是倾向于将企业分散在农村地区，而不是集中在大城市。这一点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在1973年初访问过延安南面比较有名的南泥湾五七干校，亲眼目睹了毛主义和文革的所有这些特征。五七干校的学员都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些专家。我记得曾经与一些外科医生和建筑师谈到他们在干校的生活。有三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干校基本上再现了延安时期。干校建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地区，是由学员们自建的一个营地。如同外来移民一样，学员们自己种菜烧饭，料理家务。几位医生特别告诉我，所有的用具都是他们就地作或获得的。他们似乎对他们就地取材建造的一架手术台非常自豪。手术台很不稳当，非常危险，只要往上面放点东西，就会歪斜。建筑师将水泥混合起来，铺砖，盖屋顶，凡是与建造房屋有关的事情，都由他们负责。就像外科医生因陋就简建造的手术台一样，建筑师盖的房子看上去也摇摇欲坠，屋顶可能还渗水。但是，这恰恰是毛的理想的本质所在。每个人都采取同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消费模式。如同在延安的那些黄金岁月一样，人们用的是土办法，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但是，这种技术上的落后性质却被说成是干校的宝贵财富。现代专家只能起非专家的作用，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与投入产出的优化原则截然相悖。再过一百年，人们在回忆文革时会看到，文革是要按延安模式来改造整个社会，带有各种各样的反现代化特征。

（刘锋译）

注释：

1. 朱生豪的译文并未清楚译出“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这一英文说法的真正意思。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指：某人要做一件迫不得已、非做不可的事，但却装成很乐意很自愿的样子。比如，市长迫于选民压力，不得不削减预算，但却装成自动自发的样子，还大力谴责政府的花费。引文中说话的人是盗匪头目，他遇上一个从城市被放逐出来的年轻绅士。他就叫绅士来做匪帮首领。因为绅士已被“逼上梁山”，他就“假装甘愿为之”了。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这个原本是“城市”政党的领袖，也被“驱逐”到落后偏远的农村，但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了积极正面的政治观和文化观。

2. “现代化”(按照韦伯 Max Weber 原来的定义,就是理性化)的本质就是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从狩猎采集的社会一直到今天),一切技术的、经济的和组织的进步显然都表现为一种直线发展,即专业化水平来高,劳动分工来精细。在文明的开端,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只有少部分人承担各种专业职能(统治阶层、武士阶层、神职人员、技师/工匠等等,大多数人都耕种土地)。职能愈是专业化——技师愈是专业化,专业化带来的益处就愈大。最近几十年,许多学者都变成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一切关于“现代化”的论述都已经过时,只反映了一种直线进步观,将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的主体。韦伯的理性化的本质实际上就在于,人类支配自然以求生存的方法愈来愈有效率。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理性化是一件坏事。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其重要著作《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1979)中把对效率的追求(即投入产出的总体关系的优化)称为“运作可行性”。他将这一点与现代联系起来,但是,“运作可行性”作为一个标准,是与人类一道出现的。毕竟,投入产出的优化乃是一切人类社会谋求生存的方式。限于篇幅,我不能讨论后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在此,我只想提一点:后现代主义挑战了韦伯的理性化概念。

3. 极端民粹主义是指一些声称代表着整个民族的运动和意识形态,它经常声称代表着贫穷的大众,将其调动起来。

4. 谢淑丽(Susan Shirk)在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一书中将“德治”一词用于文化大革命。

5. 例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的极端反传统主义》一书中认为,在儒家思想中,意识是最重要的。

6.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 Thomas A.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职能愈是专业化——技术人员愈是专业化——投入产出的优化水平就愈高。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革命实际上是朝着经济角色的更大的职能专业性的一次大跃进。在经济中,劳动分工愈来愈精细,形成一个以专业化的机器操作者、而非手艺人师傅为主干的制造系统。在现代官僚国家中,这一分工原则也被用来管理社会(劳动分工来精细)。

作者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

□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

~~~~~

## 【前事不忘】

### 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

•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

####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国内,流行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似乎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关心不够。甚至于说，中国人想回避对文化大革命的回顾。为甚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笔者认为，说中国人对文革历史不够关心的看法是很值得探讨的。一方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确实有不少中国人想尽办法来避开对文革的回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自文革开始至今，在中国，有关文革问题的各种各样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而且方兴未艾。有官方发布的正史（即中共中央文件及党史出版社等出版的书），也有民间出版的众多野史（即非官方的讨论）为证。

其实，中国人讨论文化大革命，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相当类似德国人在战后的很长时间内对德国二战、第三帝国历史的态度。本文试图将德国的有关历史过程和今天中国对文革的态度加以对比，最终说明道德记忆的力量。

## 二、德国的经验

1967年，德国学者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夫妇〔1〕曾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在德国，第三帝国失败后，虽然不少知识份子提出要面对德意志民族在战争当中，以及在对待德国和所有被占领国的犹太人的问题上所犯的滔天罪行进行反省，但刚刚经历过战争的大部分德国人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反而，那时候国家和人民同心协力，想尽一切办法为德国建设一个在经济方面非常成功的、美好的今天和未来。

也就是说，德国人在那个历史阶段中，没有学会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根据米切利希夫妇的分析，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失去他们的最高领袖，而这个领袖曾经能让其每一个崇拜者作出常人所不可想像的事情来，并且这个最高领袖还使得每一个人通过崇拜他而提高自己的尊严和信心。没有对领袖的崇拜，几乎很难想像发挥出超过本人才能的事情，也就没有了一种超越自己的认同感。一旦这个领袖不复存在了，原来那些因崇拜这个领袖而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人一下子觉得失去了存在的重要支点。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历史反应是：在忘记过去而努力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同时，人人都将自己看成了当年领袖的牺牲者。

米切利希夫妇针对德国60年代的情况，向德国民族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一个民族在经历了这样一种灾难性的集体经验之后，只有克服了简单地把自己当作某种历史过程的牺牲者的倾向，才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共识。唯有如此，这个民族才能最终学会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应该对真正的受难者产生同情心，并且认识到，活下来的人不可能都是牺牲者。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活下来的人，往往既是牺牲者，又曾经当过同路人，甚至加害者。活下来的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接受过去的两面性的同时，认识到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责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对真正受难者的同情心是不可能产生的。

如果说，今天的德国人已经学会了面对自己的历史，那么，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产物。自从二战刚结束后不久，胜利者对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精英进行了法律上的处理，此时德国知识份子提出罪责与责任问题。到了60年代，德国年轻一代强烈要求对第三帝国时期作出公开讨论，则是这个过程的开端。这之后，从德国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到前任德国总统魏茨泽克（Richard v. Weizsacker）在德国议会前公开承诺德意志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她对过去的责任，都表明了德意志民族最终转向了能够对受难者产生同情感和道德的反省，实现了米切利希夫妇在60年代提出的要求。

上述历史过程的成功转变，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所有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很多须要公开讨论的问题尚未能够提出并加以讨论。其中承认有责任，甚至有罪的人说出自己所受的苦是否有其正当性，则是今天德国人最关心的问题。这个

问题还在等待一个能够说服人的答案。

### 三、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局限性

参照德国战后的历史，可以这样说，那些认为中国人对文革历史讨论不够的看法也不无道理的。问题在于，既然有关文革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到现在为止，人们仍没有形成关于文革的共识。为此，有人始终感到不满足、不甘心，他们在期待着人们继续寻找这种共识，期待着一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过的讨论，还期待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给予的回答。

在中国，官方的结论一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那么，人们是否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对文革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或者说，在共产党还没有作出有关文革的全面评价之前，中国人民对文革难以有自己的历史结论？

中国共产党在1981年已经发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看起来，这个决议还没能够满足人们的所谓共识要求，这是因为：

- 《决议》只涉及到上层权力斗争的问题
- 《决议》对文革作为群众运动的说法甚不明确
- 《决议》也不能深入评判文革的是与否、有理与无理的问题

官方为甚么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是因为一些共产党的最高层领导者在文革结束后，虽然被公认为是受迫害的，但事实上，他们在受害的同时，也曾经紧紧追随着毛泽东；他们确实是文革的受难者，但同时他们对文革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即使在受到激烈批判之时，也不敢公开反对文革。因此，他们不可能称自己为反对文革的英雄，也不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受难者，恰恰相反，他们曾经是文革中紧跟着毛泽东的同路人。他们对文革的态度以及在文革当中表现的两面性，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文革的是与非做出明确的判断。

至于红卫兵运动初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部分属于高层领导的后代，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红卫兵运动。因为这样做的话，就等于否定他们自己，也就等于关闭了他们日后成为参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的道路。

从中国的决策层来说，则处于两难状态：如果完全否定红卫兵运动，无疑等于否定高层领导的后代，导致共产党后继无人。但是，如果为了保护这些高干子弟，而不去批评那些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要人物，却只批评造反派，也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即导致再度出现分裂的可能，而这种分裂不仅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分裂，也会引发社会的分裂，对文革以后的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不仅如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己的子弟的保护，也有可能被那些干部子弟误解，似乎他们会在不用受到批判与教育的情况下就可以马上参与政治领导阶层。但是文革的经验告诉了他们的前辈，高干子弟具有政治野心，并不甘心等待老一辈主动退出政治舞台。

正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1981年的《决议》不能对文革作出很明确的评价，没有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反而把中国人都说成是文革的同路人，都先被毛泽东和文革的理想所迷惑，以后才成为毛泽东和文革的牺牲品。同时，这个《决议》也无法对文革的很多问题作出回答，自然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期待。正因为这样，为了保护自己，这样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共产党既未能按照受难者的要求为他们平反，同时也不可能减轻当年加害者在心理上的负担。

### 四、非官方讨论的局限性

如果说官方的文革结论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么在众多的非官方讨论中，是不是可以产生出一种对文革是既全面又公平的评价呢？也不能。为甚么？这是因为：非官方的讨论至今仍是十分分散的，每一个记忆团体只关心他们各自在文革中的经历。

按照米切利希夫妇的分析，在经历过像文革那样不幸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个民族要重建自尊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各个记忆团体都无法对此历史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历史评价，而只能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竭力保护自身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后来的知识青年，凡是在今天社会上有了一定地位并感到相当满意的那些人，也往往反对全面否定文革，而其中受过苦难且没得到社会地位的人则一直为自己叫苦，并把今天的困难看成是文革产生的后果。至于老一辈知识份子，他们一般很少把自己的经历表述出来，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往往是通过自己的后辈写出来的。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具有为他们从事团体记忆服务的杂志，以及非公开的交流记忆的场合。但同时，他们也为不能公开地诉苦而感到不满。总之，每一个记忆团体都有其服务的交流形式与符合其利益的集体记忆，但却难以产生出一种对文革的新的共识。

德国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为了打破社会上有关二战和第三帝国问题的沉默，在60年代的大学生运动中曾强烈呼吁德国人一定要学会面对一切历史问题。那么，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又是用怎样一种态度来对待文革的呢？众所周知，直至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从教科书上能学到有关文革的知识极少。再加上以上所述的非官方性的讨论或著述，全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记忆团体内部进行的，且不说这种分散性特点决定了它的影响难以超越其有限的小范围，以至难以引起下一代人对它们的关注，更谈不上对社会产生影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尽管学生一代对文革不太理解，但还是有他们特定的了解方式，最突出的表现是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这一运动告诉我们，文革后出生的那一代或多或少还在持续自1919年“五四”以来的传统，甚至红卫兵的传统，即认为只有年轻一代才可以救中国，才有本领替社会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作风、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民主和不公平。完全可以说，他们当时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实际上是文革那一代精神的延续。如同他们的前辈，他们不懂得这种理想主义会造成甚么样的后果，而只是崇尚理想。而他们父母那一代支持学生运动的现象也能说明，在对文革进行多次批判之后的中国，还或多或少保留着文革时期的那种理想和价值观。

希望全面否定文革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能说，中国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学会面对自己的不幸历史。而希望保留文革初期那种理想主义精神的人也不能满意，因为他们有关文革的记忆得不到官方认可，在社会上也难以占到主导地位。

## 五、如何面对和超越历史上双重身份的尴尬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新的共识能够从哪里产生出来？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共识因为没法分清是非的界限而缺乏说服力，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说法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能够统一大家的思想。

怎么办？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看，这能否是一个解决办法？我们以上已经谈到了，似乎这是唯一能够让社会各方面产生关于文革不幸事件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恰好也最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所以最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但这样会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即影响历史的主体性的认识与能力。正如美国学者弗德曼（Edward Friedman）指出的，中国人自1940年以来一直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看，这是最不应该有的观念。因为，如果受害者把自己的这种观念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变为了对下一代人的加害者。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看作牺牲品，那么，这个民族最终会丧失对历史的主体性的认识与能力（2）。

反过来说，对经过文革的那代人而言，忍耐着历史事件的双重性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常常因自己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而陷入了相互矛盾和倍感尴尬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大部分人采取了前文所说那种实用主义的办法——忘却自己作为加害者那部分的经验，而突出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这一部分经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真正的文革受害者却被忘却了，因为对这些人的回忆会影响上述实用主义的成效，更具悲剧意义的是，这些真正的受害者却因为不能死而复生而无法在今天站出来说话。

但是，毕竟还有一小部分人敢于谈到文革的真正受害者问题。巴金先生曾经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遗憾的是直到巴金在2005年逝世，这个愿望仍未能实现。在文革武斗阶段中，在全国各地曾竖过的墓碑现在也几乎全消失了。但是，有一个人叫王友琴，她二十五年来坚持不懈地在做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和学生的调查。最近，王友琴在香港出版的书中罗列了文革中六百多人的死亡经过。意想不到的，她的做法在互联网上却遭到激烈批评。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尽管承认她工作的价值，但仍抨击说，如果把学生打老师当作是文革的全部，只能说明这个人根本没看到文革的实质。甚至有人说，王友琴在学生打老师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打老师，打的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表，打这些人的不是学生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王友琴的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在国外挣到更高的学术地位而已。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文革初期语言的翻版，谁能想到文革时代那些荒谬的思维逻辑，直至今天仍然在某些人的脑中保留着？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一贯老老实实，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被打成反革命；对人的评价不需以事实为根据，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因为表面上很老实的人，本质上很可能是反革命份子。王友琴从来没说过她做文革初期学生打老师的调查就代表了文革的一切。不管她的工作还有哪些不足，我们都应予以肯定，这是因为王友琴提出的问题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各样关系到文革回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并为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如果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敢面对文革的历史，那么原因也可能在这了。忘记文革各种各样的几百万真正的受害者，是以上所提到的实用主义应急措施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家对王友琴的激烈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理解的是，为甚么在文革结束近三十年之时，还有不少人继续把自己当作牺牲者，而看不到别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 六、结束语：道德记忆的力量

如果有人说中国有关文革的讨论不够，上文已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了说明，然而提出来的原因大多数来自政治与社会方面。其实，最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是道德方面的原因。

一个民族遇到了像文革这样的不幸，应该从道德角度来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德意志民族也好，对中华民族也好，其最难理解的问题就在于为甚么社会上大多数人曾经能够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其伟大的领袖走。这种反道德行为实际上摧毁了人们的认同感，因而它不仅影响到每个人的个人认同，也影响到整个民族的认同。道德记忆和对过去的反思不仅仅是处于对受害者而言，对民族重建认同也是极为必要的。这种道德性的反思成功与否，表现在它能否真诚地悼念这个历史事件的真正受害者，并在悼念受害者的同时承认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这正是为甚么现在国际上普遍认为德国人面对二战和第三帝国的历史有一定的成绩的原

因所在。尽管有关1933—1945年这一段历史，德国的老人各有自己的记忆和面对历史的方法，但最近几年来，社会上大部分人在经过长期的反思之后，都能承认当时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受害者地位，并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在那个过程中所起的双重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因为现在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那一辈人，都没亲自参与过希特勒德国的所作所为，所以也有可能把对受害者的同情及对自己的双重性的认识定为全社会的新共识。这个共识包括参加者及其后代，不管他们是否有罪，但都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已超越受害者、加害者及同路人的概念，因为它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每一代人在面对这一段历史时，都会向历史提出不同的问题，并对此作出新的回答。这就是这种反思过程永远不会结束的原因所在。不过，下一代提出的问题总会与上一代提出过的问题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的，所以不能认为，从道德角度对历史进行反思而重建民族认同问题，是可以仅仅靠时间来解决的。

现在，不少人对中国有关文革的讨论感到不满意，并一直把德国当作榜样来进行比较，这与德国人终于能从道德角度来处理问题有关。中国人历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讲道德的民族，往往认为虽然在物质方面比不上西方，但至少在道德方面可以超越西方。如果说文革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起了破坏性的作用，那就是因为文革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使中国社会失去了对自己高尚道德观的自尊心。中国人再也不能以其高尚道德观来做其认同的基础。中国人跟西方民族一样，只能通过其物质方面的成绩把自己突出起来。在中国，党的决议也好，非官方的讨论也好，都没有真正触及和文革有关的道德问题，于是不管是哪一代的中国人都对有关文革的讨论不满意。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讨论还没有能够无限制地、公开地进行的后果，而且在于这个讨论还没有达到道德的高度。这样，中国人对文革还没有作出全面的和公正的评价就成为一种自然结果。

所以应该说，在中国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讨论确实是有的，但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有待大家关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注释：

1. 亚历山大·米切利希 (Alexander Mitscherlich, 1908—1982)，德国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几次被逮捕，曾到瑞士避难，在那儿继续学医，1939年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毕业，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教授论文获通过，1949到1966年在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从事精神分析治疗法，60年代成为德国人对待自己的历史的批评者，跟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米切利希 (Margarete Mitscherlich) 共同撰写著名的《有关悼唁的无本领》(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1967)。1960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弗洛伊德研究所后被聘为该校教授，在那儿任教到1976年为止。

玛格丽特·米切利希 (1917—)，丹麦人，在海德堡大学学医，1949年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在海德堡、斯图加特及伦敦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法的训练，从1951年开始跟亚历山大·米切利希一起工作，1955年跟他结婚。除了跟丈夫一起从事有关德国战后社会心理的研究外，她也在有关妇女解放与妇女心理特点的研究方面闻名。

2. Edward Friedman, "Modernity's Bourgeoisie: Victim or Victimizer?" China Information 11, no.2-3 (1996-97):89-98.

作者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教授

□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